

中国工业史研究的开创性硕果

——评祝慈寿著《中国古代工业史》、

《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现代工业史》

胡 寄 窗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已出版了不少部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类型的著作。在中国经济专史方面探讨农业、商业、田制、税制、外贸、财政、货币等等的专著也不少，甚至对国债、钞券、邮政、物价、关税、合作运动等等的专史也曾刊行，唯独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专著却一直是个空白。为什么出现此空白？我认为不外是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到解放前夕，尚未形成其完整体系，无必要编写它的专史。二是我国的近代工业虽起步较晚，而封建手工业的存在却已有两千余年的发展繁荣历程，如再联系到古代青铜器、陶器等的制造工艺，那就得追溯到夏商时代。要编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工业专史，决不能仅阐述其近代工业，必须对封建手工业和更早的工艺发展过程也有所论述。但是，封建时期的手工业一向包容在商业之内，连古代有名的盐铁制造富豪也被看作是“因通商贾之利”而致富。到战国后期将工商视为“末业”之说出现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实况更不受史学家们的关注，此所以历代《食货志》均未给手工业发展情况设立专篇予以表述。因此，在编写一部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对其封建手工业部分之资料的爬梳整理难度是相

当大的。至于我国名闻于世的古代精美陶器、青铜器，如无精湛的工艺技巧即不可能制成，这也是编写古代手工业发展历史著作的不可缺少部分。但此类史料在我国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只有通过现代大量出土文物的验证才能窥见其发展概况。如无大量出土的文物为依据，则夏商和周代前期的此类工艺发展概况已无法知晓，更不谈将它写成史学专著。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若干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史之成为空白实为势所必然。当然，即使在今天要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工业史仍有较大难度。因为将未经过系统整理的浩瀚文献史料和分散的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分析概括，既须具备敏睿的分析能力还得付出长期的辛勤劳动，才可望做出成果。

祝慈寿教授早年专攻中国经济史和工业经济学，均有学术专著问世。从50年代后期起始全力从事于“填补”中国工业史这个“缺口”。他运用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经过30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工业史》、《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现代工业史》等三部共240余万言的巨著，分别于1988、1989和1990年先后出版。

这三部姊妹篇著作结合起来即为一部完备的中国工业发展史专著。这三部著作如分

开来看,它们在各自探索的历史时限内均已首创而无先例的;如将它们结合起来看,其填补这门学科空白的学术意义尤为突出。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各种学术领域中,通过集体的协作在数十年的时间内,获致巨大的创造性科研成果的事例殊非罕见。而通过个人的独力钻研并几乎在未得到任何外力支援的条件下,能像中国工业史著者那样获得填补空白的丰硕学术成果,就更为难能可贵。

祝著三卷中国工业史占有的史料可称为丰富而全面的。其中,古代工业史部分沿着历代王朝的历史顺序把各类工业的主要特征、著名产地、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古代技术的外传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均作出条分缕析的表述。特别是对古代曾出现过的各种类型的工业均一一分别地加以介绍,而对各工业类型搜罗之完备可谓至矣尽矣,令人能一目了然祖国古代工业之全貌。关于近代工业史部分其历史时限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其内容以清末和民国的近代工业发展的研究为主线,但对太平天国的、外资经营的、合作运动式的、革命根据地的和沦陷区的工业发展情况,皆设有专章或专节作系统的介绍,其覆盖面之周全可谓巨细无遗。关于现代工业史部分是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工业发展概况,其中,对台湾工业化过程也进行了极为周详的分析,体现了著者的“一个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一般的中国史学著作中的确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三卷中国工业史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是史论并重,反映了著者不少的独特分析观点。例如,对各个历史时期工业发展的特点及其演变的原因均有较深入的总体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也应用到个别类型的许多重要工业。对上世纪洋务派主办的各种工业之形成、资本来源以及它们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

用均有较客观的分析,不象一般历史学家那样对它们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又如对日中的工业发展过程曾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以及指出解放后工业的发展是“就业结构转化落后于工业结构转化”等等的独到观点甚多,不必一一列举。总之,编写这三卷中国工业史巨著的要求,正如著者在其现代卷的序言中所说的:“必须做到有史料、有观点、有分析;还要求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这样,既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又能说明各重要问题的性质及其影响”。这些要求,著者是完全达到了的,我还要代为补充一句,即达到了一个开创性硕果的水平。

任何一部成功的学术名著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如果须指出三卷中国工业史有那些缺点的话,我初步想到有下面两个问题。一是著者将夏商时代肯定为奴隶社会。这种古代史分期观点,是由郭沫若的臆造在中国历史学界(包括考古学)形成的支配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未说过“古代东方”(当然包括中国)曾存在过典型的奴隶制度。三卷中国工业史著者如能摆脱此分期观点的束缚,丝毫无损于其著作的合理性和开创性。二是著者的编写计划一开始就准备将其巨著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卷作为能分别独立刊行的专著,因此,各卷均须有其“绪论”,而近代和现代两卷的“绪论”共有180余页之多,其中不少篇幅系追述前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发展概况,重复势所难免。又古代部分的历史时限长达5000年,近代部分为110年,现代部分仅40年,而三部分的篇幅各在80万言左右,这就使三卷的编写体系互不相同,无法统一起来。作为三部独立著作,各有其特殊编写体系不会成为问题,如象著者设想那样使它们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工业“通史”或“专史”,就是其美中不足。但这些编写体系的技术问题,仍无损于其是一种开创性硕果的学术价值。